

中国儒商与长三角城市的发展

张 锋

(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13)

作者简介: 张 锋 (1942-), 男, 浙江绍兴人, 原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 主要从事城市与经济发展研究。

摘 要: 深入发掘中国儒学和儒商文化资源, 深入研究中国儒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对于促进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加快崛起,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儒商; 中国传统文化; 长三角; 城市

中图分类号: B222;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 (2008) 04-0031-06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上提出:“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发掘民族和谐文化资源, 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 倡导和谐理念, 培育和谐精神, 营造和谐氛围, 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 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李瑞环同志说,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他所创造的儒家学说博大精深, 包括了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艺术等方面的思想和主张, 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世界民族之林, 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有着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深远影响。”深入发掘中国儒学和儒商文化资源, 深入研究中国儒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 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对于促进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加快崛起,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国儒学和中国儒商

中国儒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瑰宝, 是世界文化的重要遗产。儒, 在传统话语中, 指读书人。儒是一种修养, 一种光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传统文化经典多属儒学。2500 多年前的春秋时代, 孔子为挽救礼崩乐坏的乱世, 宣传用仁义取代暴力, 救世济民。经他整理后的儒家经典, 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及其弟子创立了儒家学派, 孟子、董仲舒、韩愈、王安石、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诸多儒家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根据社会需要, 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儒学。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 孔子便成了圣人, 乃至全社会的精神领袖。儒学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 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形成了中华道德国家、礼仪之邦的传统, 创造了光彩夺目的灿烂文化与举世无双的高度文明。儒家经典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法典。儒学倡导的许多美德与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自成一体的文化思想遗产, 它具有巨大的传统力量与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儒学倡导“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强调“忠恕之道”、“和为贵”, 主张“仁政”、“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治国理念, 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儒家思想中包含的和合、包容和更新的精神, 对于今日中国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提高社会普遍信任度进而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珍贵的启迪和工具作用, 对于在实现多元化的跨文化交流中化解世界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和世界各国的和平、合作有着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中国儒商为中国传统商人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追求为准则去经商, 在商业行为中渗透

了儒家所倡导和躬行的“仁、义、礼、智、信”。他们是有较高文化素养、品德高尚、见利思义、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功商人，是以诚信为人生准则，既有很深的文化素养，又有较强烈人文关怀的企业家，是义利兼顾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商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衍变的过程。在我国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一部分商人在经营活动中由不自觉到自觉运用儒家的文化精神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使儒家伦理文化与商业经营活动逐步融合，从而慢慢酝酿产生了儒商。先秦时期，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分工”的职业分工。孔子提出“据义求利”、“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的思想，为士族与商人的沟通及儒商的孕育作了舆论准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子弟可以经商，政治家也可以弃政从商。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就是儒生从商成功的典范。子贡是孔子门下的七十二贤人之一，曾在鲁国和魏国做过官，后来经商致富，“家累千金”。子贡经商有三大特点：一是善于结交诸侯。鲁国贫弱，为求安全，请孔子让子贡去各国游说。子贡利用他的滔滔辩才和拥有的钱财，打动了诸侯及其重臣，终于使鲁国转危为安。子贡的品格及才华深受各国诸侯敬重，在各国经商得以畅行无阻，倍受优待。二是注重了解市场行情。孔子夸他“判断正确，屡测屡中”，使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三是懂得掌握供求关系。子贡深知物以稀为贵，他善于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作出取舍。子贡并不是个吝啬的守财奴，随孔子周游列国时，常慷慨解囊，受到诸侯们的礼遇。有政治抱负的儒商子贡，运用自己的财力与智慧，出色完成了各种重大任务。春秋末年杰出的政治家范蠡，在帮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便北上齐国，定居在陶（今山东定陶），改名陶朱公，弃政从商 19 年，富甲一方，成为显赫的儒商。他著有《陶朱公理财致富十二则》、《陶朱公商训》、《陶朱公理财致富十二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营商名著。

儒与商的真正“合流”是明清时期的事。“古者四民异业”的现象到了晚清时已有相当大的改观。据史书记载，明嘉靖年间，弃农经商的士大夫已“三倍于前”，士大夫“耕读世家”的传统受到有力的冲击，儒商作为一个群体由此应运而生。这一群体大致有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士大夫中弃“儒”下海经商者，这部分人从身份上看已实现了由士向商的转换，然而其思想理念、价值导向则不悖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二是由商而进儒者，这部分人原本不属于士族，但有其一定的传统文化素养，受儒家思想熏陶渲染，浸淫商海后对奸商、恶商、霸商坑人的劣迹十分憎恶，故虽为商人，亦存儒风，在经营中能坚守童叟无欺等道德底线。明清儒商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徽商。徽商有以儒家道德观念经商的主张，亦有“以儒术殒商事”的实践，以认同儒商为时尚。这使得徽商普遍具备了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进步的商德，其道德自律和自觉在我国商业文明开始之初就达到了令人赞叹的水平，这是一种根植于儒家伦理沃土纯粹的本土化文明。

进入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量贫民为谋生涌向世界各地。他们大都以经商为生，从小买卖做起，凭着刻苦耐劳和聪明才智，铢积寸累，聚沙成塔，抓住机遇，埋头苦干，不少人终于从小本经营一步一步发展成为跨国集团。使华人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华商在海外的崛起，同样是由于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古为今用，奉行“天人合一”，洋为我用，奉行“拿来主义”，吸取西方文化精华，以理定法，纳法于仁，讲信用，重道义，追求合理性和高效率。海外华商中涌现出规模宏大的儒商群体，他们以宏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在商不唯商，求利不惟利。懂得财富取诸社会用诸社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讲德重义，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华企管理模式。注重发扬团队精神，继承中华民族重教的优良传统，力促文教事业。扎根新土，又反馈故园。华人儒商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为推动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上世纪 70 年代末，通过改革开放，我国走上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深刻转型，儒商有了充分用武之地，商场成为孕育现代儒商的摇篮，又是儒商大显身手的舞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下海”热。在改革、转型中，人们把商品经济形象地比为大海，“下海”就成了“经商”的别称。时代大潮中涌现出一代新儒商。怀着从商的事业心和远大的抱负，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与充满理想色彩的追求，是他们的突出特点。他们中有人说：“我们办这个企业的目的，就是希望成为能够唤起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为国家的决策出谋划策的民间智囊团体。我们还想设立一个比诺贝尔奖还要大的奖项，专门奖励给世界上研究中国问题卓有成就的学者。”有人说：“我不是来凑什么热闹，‘下海’有两个理由，一是希望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二是想试试我这个人到底有多大潜力。我认为，真正的作家永远不会放下手中的笔，但决不能当生活的旁观者。”还有人说：在他“下海”之前贯穿在他作品中的一条红线是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被现代思想修正过的，融入了儒家思想的积极成分，概括地说，就是“民胞物与”情怀与济世拯民的仁心义举。他当了企业家后，正是这种思想使他对企业与劳动者关系的处理，对周围人与人关系的处理，具有东方式的儒商风范。许多“下海”的文化人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儒与商并不是对立的，完全可以有机地结合，商代表经济基础，儒代表上层建筑；商是硬件，儒是软件；商代表物质文明，儒代表精神文明。亦儒亦商就是“两个文明一起抓”。21 世纪是儒商世纪。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神州大地涌现出大批儒商。拥有高学历、高智商、掌握了各种特殊才能的文化人一批批地从高等学府、科研机构、政府机关走

出来投身商海。许多知识界精英以接受智力股方式或应聘担任企业领导职务方式进入商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儒商。弘扬儒商精神，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塑造一代高素质的中国企业家，振奋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动全球华人经济的振兴和中华文化的繁荣。儒商是商界的精英，他们有文化素养，又善于运用先进的科技和经营方法。儒商又被称为德商，他们把回报社会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孔子被推荐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和古代四大哲人之一。儒家思想体系中的许多精粹，是中国祖先的精神、智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儒家崇尚仁爱，主张追求人际和谐、“和而不同”，向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世界。它对化解世间的暴戾之气，缓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具有较高文化和历史使命感的儒商，不仅是中国商人中的精英，他们也将成为国际商界的楷模。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大批有文化道德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者从事商业经营后，使得新一代儒商脱颖而出，21世纪正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代。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纪，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东方文化崛起的世纪，更是中国儒商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纪。

二、中国儒商对长三角城市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近代中国儒商的重要发祥地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一地区是中国和世界著名的河口三角洲之一，开发历史悠久，隋唐以后，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和南北运河的开挖，便成了国内首富地区。明清时代，这一地区不仅是中央官府粮食的主要供应地，也是最大桑蚕和植棉区。兴盛的农业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也促进对外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已进入农业社会后期，并孕育着诸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因素。这一地区城镇密集，形成了我国最大的城市群，并被称为正在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19世纪初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十大城市，有四个（南京、苏州、扬州、杭州）位于这一地区。历代中国儒商对长三角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遵圣贤之道从商，形成良好城市民风

崇尚儒家文化、重视功名仕途的徽商在明清史和中国商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把追逐财富作为一种手段，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才是最终目的，他们支持并积极参与“振兴文教”事业。先儒后商，或先商后儒，或亦儒亦商，商儒结合，成为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特色，由此诞生了明清时期中国商业最灿烂的文化精神。他们一方面从事商贾之术，一方面在道德伦理的修养方面效仿儒家风范，接受儒家伦理和价值观。徽州儒商以其创造性的实践展示了儒商结合的优势：既谋商贾之利，解衣食之虞，又得令人称羡的社会地位和维持正统的伦理价值。徽商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接受能力强，认识新事物快，善于从各方面了解行情，熟悉商务。徽商的吃苦耐劳精神闻名遐迩。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他们无远而不屈，无微而至。他们遵圣贤之道从商，“经商诚为本”。以仁爱之心待人，童叟无欺，讲究商业信誉，做到在商不唯商，求利不惟利。既推动人欲解放，又规范节欲行为，反对恣意纵欲，提倡节俭。热心公益事、慈善事，促进崇礼风气形成。他们倡导“以礼代理”，创立出新理学道德哲学和哲学转型的社会学，以替代陈旧的“宋明理学”。在崇尚礼教，为扭转社会风气实行其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创造出崇尚自然科学的环境，促进形成良好的城市社会风气。以勤俭持家、仁慈待人、知书达礼、行善积德为主流的新道德标准的建立对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积极开展商业活动，促进城市经济繁荣

徽州儒商是中国明清时代最大商帮，虽然他们惯于挟货远游，逐利四方，“足迹常遍天下”，但不论走到哪里都免不了与位于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城镇保持着密切联系。就行商而论，他们中许多人或则从长三角城镇采购了工业品远销于遥远的市场，或则从全国各地搜集长三角城镇所必需的物品，源源不断地送至长三角城镇销售。明代松江府号称“以棉衣被天下”，湖州的湖丝也已十分有名，长三角城镇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各种花色品种的绫罗绸缎行销全国乃至海外。同时长三角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棉花、粮食、木材等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而本地所产往往不能满足需要，还需大量从外地贩运，徽商正是随着长三角城镇与其他地区的商品交换而走向全国。与此同时，活动于辽东、广东、广西、福建、四川、湖广、江西、内蒙、云南的徽州行商也都无不以长三角城镇为中心进行商品贩卖活动和展开商业贸易。长三角城镇更是徽州儒商坐贾和典当商人最为集中的地方。明清时期，长三角城镇广大的小生产者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商品生产的旋涡。一方面，广大小商品生产者的资金和原料的贮备极为有限，为了保证再生产的不断进行，就必须随时出售自己的产品以购进生产和生活资料；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致使某些商品的每个生产环节都成了专门性的行业，这就使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收购与推销都离不开商人的经营活动，长三角城镇自然成为商人活动最为频繁、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商人最易生财牟利之所。富于经商经验和传统、善于趋时逐利的徽商也自然把长三角城镇作为群趋逐利之场。长三角地区不仅大城市徽商集中，许多中小城镇也为徽商汇聚之所。长三角城镇经济对徽商的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徽商积累了巨额的商业资本。这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徽商将部分资本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对我国资本主义萌芽起了催生作用。徽商对长三角城市的兴起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3、以商为主兼顾文化，改善城市投资环境

中国儒商在长三角城镇资产日渐丰盈，并不只是钟情于声色犬马，他们在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园林、建筑、医药诸方面投资，造就人才，造福地方，增加文化积累，遗泽后人。清代扬州书院教育十分发达，多由儒商出资恢复、重建、新建和维持日常的书院经费，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对于推动扬州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明清时代扬州的繁华，主要得益于盐运和漕运事业的兴盛，富起来的盐商，为了攀附官府，争取社会地位，便寻求走“贾而儒”的途径，兼商人与士子于一身，融厚利与富名于一炉。他们仿效文人主持风雅活动，广交文友，与士子、书画家密切往来，并以雄厚的财力给予资助，活跃了扬州文化气氛，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扬州八怪就是这时与盐商相互依存，生活得以安定，艺术上得以发展的。盐商富贾结交文朋画友，重金收买扬州八怪和其他一些名家的字画，从而也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商品化。在扬州盐商和文人画家携手营造起来的浓厚文化氛围中，为适应商品经济的需求，扬州八怪诸家作品，自成一家，显现出勃勃生机，给 18 世纪画坛带来一派新风，同时也优化了扬州的投资软环境。

4、热心公益事业，推动城市建设

近代活跃于长三角城镇的儒商，他们热心公益事业，致力于构筑新城及修复风景名胜、造桥铺路等，对长三角城镇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既有雄厚实力，又有较好文化素养，又与朝廷、官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扬州盐商，为迎接清朝皇帝南巡，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园林修建。扬州园林都是盐商的私家园林，皇帝的临幸对这些盐商来说乃是无比荣耀之事。同时，园林也是盐商向外标榜与宣示自身追求与文化修养的一种做法，使得扬州大大小小的盐商都愿花费大量财力去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园林世界。扬州有许多名胜古迹，由于岁月的流逝，人为的、自然的破坏，损坏日益严重。一些扬州盐商不仅出资重修了这些名胜古迹，有的还在名胜古迹旁配套建设了一些新的景区。扬州盐商因财力雄厚，又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对城市环境改善投入一定资金，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公益原因，正是由于这样巨大的投入，扬州在盐业鼎盛时，城市建设也走向了辉煌。

5、积极发展实业，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历史上的长三角已是举世闻名的制造业基地。江南一带自古是丝绸的故乡，著名的四大绸都杭州、湖州、苏州和盛泽以及江南制造局便诞生于此。在中国对外贸易历史上，宋元两代是中国瓷器开始大规模走向世界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瓷器的代表便是生产于浙江余姚、绍兴一带和温州附近的瓷器。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儒商所作的努力。19 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值此民族危机深重的艰难时世，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克服困难，努力发展民族工业。长三角城镇一批具有崇高使命感的儒商秉持“实业救国”的理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工业界，在上海、无锡、南通、常州等城市办纱厂、布厂，以抵制像蝗虫般扑进国门的洋货，创造了辉煌业绩。他们在大办实业的同时也兴办教育，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推进了长三角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6、改革开放中涌现的一批新儒商，推动长

三角城市前进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新儒商与传统儒商在经商理念中都有以孔子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儒商内涵中都包含道德、文化、经济三位一体。但新儒商是在新时代、新历史条件下产生涌现的。新儒商新在“儒”是借用，作为有道德有文化的含义。其道德指新时代人类一切进步的道德，也包含进步的法律在内。其文化指人类拥有的先进文化，包含科技知识和人的智慧在内。“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人，而是现代商家和企业家。新儒商是新时代的精英，是新时代产生的“知

本家”。他们推动着长三角城市前进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

三、弘扬儒商文化加速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

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的《2008 长三角城市发展报告》认为：长三角城市群面临着长三角区域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带来的重要机遇。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的即将公布实施，将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揭开崭新的一页。长三角城市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具备了向更高目标迈进的坚实基础。长三角城市群将在壮大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推动长江流域快速崛起、带动中西部加快发展、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引领我国全面参加全球竞争中发挥核心作用。长三角区域功能将定位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我国率先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地区，大力弘扬“博施济民、仁民爱物、以义取利、以和为贵、以智经商、自强不息”的儒商文化，将对加快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弘扬儒商文化，优化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国际环境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儒家崇尚仁爱，追求人际和谐，“和而不同”，提倡“有容乃大”，融合冲突，化解矛盾，向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世界，与今天人类追求的和平与发展理想相吻合。弘扬儒商文化，有利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促进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2、弘扬儒商精神，营造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说：“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的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世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江泽民同志说：“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肯定。儒商文化倡导“博施济民、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变化日新、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构成了“整体主义、艰苦创业、团结奋斗、建功扬名”的儒商精神。弘扬儒商精神有利于引导和规范商业行为；协调两个效益、两个文明共同提高和发展；增强民族文化科技意识，促进文化科技、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推动廉政建设和净化社会空气，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此积极营造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和谐发展的社会发展环境。

3、发展儒商经济，打好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基础

儒商经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道德观念和高科技的知识文化指导、渗透和配合的经济活动、经济事业，是一种新型的人文经济产业，促进经济和谐、协调、全面发展。儒商经济具有利己利他的社会功能，造福人民，造福社会，使社会更加进步，使世界走上和平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走上共生共荣之路。在长三角城市大力发展儒商经济，努力构建新型社会经济形态，将克服知识经济的负面效应，使长三角城市群走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高度发展的时代。

4、打造现代型儒商企业，开创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新局面

儒学和儒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儒学的重组和转换，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结合的历史任务。造就一大批新时代的儒商，正是中国经济文化特色的重要表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儒商的时代。现代儒商既是德商，又是智商，是德智兼备型的商家和企业家。现代型儒商企业是以德治商、诚

信经营的企业，又是知识密集、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是学习型、知识型和智慧型的企业。一大批世界级儒商精英正在进一步开创儒商事业。有着中华儒学传统文化根基与内涵的华商在当今世界经济竞争中，已涌现出一大批智勇双全、智德兼备的大儒商和儒商典范。他们是世界商业的旗帜，将引导世界经济向着健康有序的竞争方向发展。在长三角城市，弘扬儒商精神，大力打造现代型儒商企业，大力发展儒商企业文化，必将开创长三角城市群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www.yangtze.org.cn